

別了， 上海

〔保加利亚〕安吉尔·瓦根施泰因著
余志和译

作家出版社



別了， 上海

〔保加利亚〕安吉尔·瓦根施泰因
余志和 译

作家出版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了，上海/安吉尔·瓦根施泰因著；余志和译.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3

ISBN 978 - 7 - 5063 - 6283 - 2

I . ①别… II . ①安… ②余… III . ①长篇小说 - 保加利亚 - 当代
IV .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9306 号

别了，上海

作 者：【保加利亚】安吉尔·瓦根施泰因

译 者：余志和

责任编辑：李亚梓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邮购部）

E - 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作家在线）

印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数：227 千

印张：16.5

版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283 - 2

定价：30.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纪念曼夫雷德·图尔尼奥克
——向我介绍中国的人

交响乐团这幢具有现代气派的楼房，开了不多几扇窗户，外墙和楼顶线条舒展。它伫立在这个大都市名叫西柏林的城边，周围的废墟已经清理干净，但它仍然显得孤独、黄旧、丑陋。这个地方被某些人称为“自由柏林”。毫无疑问，事物的名称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昭示它丰富的内涵。

不远处就是那道遐迩驰名的大墙。这不是东方中国的长城，而是西方的另一堵墙。这堵墙不够雄伟，当然也无法永世长存。它把人们和世界一分为二，也使两边的思想、期盼、回忆和对时势沧桑的评价泾渭分明。不过，两边的流浪猫却能自由穿行。人们对诸般事物的见解大相径庭：这边的人对这堵墙持有一种观点，那边的人则争持另一种观点。

……我坐在第三排的右边。大厅空空荡荡，幽幽暗暗。在这天上午的排练时间里，只有当班的照明装置透出微光，就连乐台上也是黑沉沉一片，使人感到压抑。乐队正在排练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与乐队协奏曲》，指挥赫伯特·冯·卡拉扬①准是非常生气，鼻子里不时发出呼呼的声音——酸溜溜气愤的声音。排练进行得很不顺利，卡拉扬已经两次离开乐队，可他隔不一会儿又一瘸一拐地折转回来。显而

① 卡拉扬（1908～1989），出生于萨尔斯堡，奥地利著名指挥家、键盘乐器演奏家和导演。

易见，他忍受着膝盖的疼痛。

他第二次回到乐台时，仍然冲着乐师们喁喁低语。有人嘿嘿窃笑，有人挑衅性地拨响琴弦，然后又继续听卡拉扬大发牢骚。我不知道卡拉扬听见了什么——只觉得台下有一片嗡嗡嗡嗡的嘀咕声钻进了我的耳朵。这种喧聒竟使音乐大师愤怒得尖叫起来。是的，是的，这是名副其实的尖叫。然而，卡拉扬的叫声被怪里怪气的嬉笑声湮沒了。

“我让你们讲中国话了吗？！我有没有让你们讲中国话？！”

这位奥地利伟人好发脾气，要是说得更直一点——他有点儿歇斯底里。他在排练时要求大家绝对服从，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吊儿郎当！尤其是在今天上午，在他觉得一切都乱了套的时候。说不定他在怀疑大家偷偷笑他，调皮捣蛋，故意用他听不懂的中国话触怒他。更使他气恼的是，在这批欧洲优秀乐师中，竟又没有一个中国人。

他用指挥棒敲了敲乐谱架，抬起双手，但是，一开头就不顺畅。卡拉扬耍起横来，气愤地把指挥棒一折两断。确实如此——他把指挥棒一折两断，就像折断一根火柴一样，也像脾气暴躁的教员在教室里折断粉笔一样。大家跑去给他拿来另一根结实的指挥棒。也许发生这种事情已经成了一种家常便饭，因为谁也没有感到奇怪，都会像救火一样，马上给他拿来新的指挥棒。

盛怒的大师把折断的指挥棒扔在旁边，又轻手轻脚地向大厅走来，于是就发现了我。他手搭凉棚，眼睛在昏暗中搜索，然后用一种并不十分友好，甚至有些吓人的口吻问道：

“喂，那位，您是谁？”

我回答了他。

他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既没有准我留下，也没有把我赶走。他默默地转过脸去，用那根崭新的指挥棒敲着乐谱架。

“注意！再来一遍！”只过了一分钟，他又下令：“停，停，停！”

事情不妙。小提琴音乐会和乐队今天恐怕要砸锅。

独奏演员一声不响地走开了，坐到旁边一把空椅子上。他把小提

别了，
上海

琴放在一个膝盖上，脸上并无懊丧或烦躁的表情。他耐心地等着这场风暴过去。我看见了他一头长长的白发和那张苍白的长长的脸。不过，由于光线不足，我看不清他的整个轮廓。我今天正是有求于他，想同他谈一谈——电影制片人 M. Д. 在把我领进这个大厅时答应过我，一俟排练结束，他就把我介绍给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今天正是有求于这位小提琴手特奥多尔·魏斯贝格。

当然，谁都有理由问我：我到底是什么人？在柏林这个灰蒙蒙的上午，我除了来同某个人相识而外，还在这冷清清的音乐厅里寻找什么？

我没有任何特别的诉求——只想更多地了解一连串事件的详细情况，核实一些相互矛盾的证据。对某些人来说，那些甚至已被遗忘的陈年旧事，简直显得稀奇古怪和不近情理。然而，还有什么比历史更为逼真的呢？我指的是一段大写的历史、一种关乎过去的科学，只不过它还未被加以整理和归纳，还没有在学生课本里熠熠生辉，也还有一些被我们无法掌控的力量鼓捣出来的谜团。这段历史充满矛盾，许多问题尚无答案。这段历史就像生活本身那样，由于千千万万的偶发事件而显得不合逻辑，甚至还有不少荒唐之处。生活的底层存在着人吃人的现象，物欲的触角无孔不入，吸干了崇高理想的骨髓。而在生活的上层，似乎一切都经过深思熟虑，井井有条，犹如一册提供给精英阶层的算式汇编。

那么，我是什么人呢？既非英雄，也非虫豸。这么说吧——就像一出话剧中无名无姓的群众演员，只配跑龙套，没有一句对白。因此，我不便说三道四，表明自己的观点。对于我扮演的角色，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同一种现象或者事件，往往观点迥异。某人会说：事情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他说得对。不过，其他人可就同他有些差异，甚至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见。这取决于一个人在剧中是担任主角还是配角，是事件的亲历者还是仅限于坐井观天。这还取决于这样一种情况：有人善记，有人健忘；有人能记住战争中的精彩场面，但却忘了战争爆发的原因；有人记住了小

时候那家店主的名字，但却忘了当时的总理是谁。世上之人各色各样，每一个人都有权记住该记之事，忘掉该忘之事，用不着别人为他操心。

因此，我喜欢冷眼旁观，退避三舍。平心而论，我甚至不想当群众演员，就更不用说背出那些凄惨的对白了。我只想当个观众。我就喜欢呆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坐在第三排，因为客观事物有它自己的规律，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有些人是色盲，不辨色彩；有些人是瞎子，压根儿就看不见东西；还有些人是聋子，不管你大声叫喊还是低声细语，他们统统听不见。我们这些人各不相同，可事物、色彩、声音根本不因我们而存在，尽管我们常为它们争论不休。它们是客观存在。

对不起，你们再也看不到我了，我们也不会再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晤面了。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的偏颇、我的同情抑或我的造次，会使你们在什么地方受到伤害。这就像透出绷带的血迹那样，那只不过是我提醒你们，绷带蒙着的伤口尚未痊愈。

在我开始讲述虹口的故事之前，我就想唠叨这么几句。虹口位于上海市内，而上海是长江口上的一座海港城市。

* * *

虹口，上海一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鲜为人知的虐犹历史的一章。

这个历史遗存夹杂在一座新巴比伦城廓极端混乱的境域中。在这里，中国街区的居民拥挤得使人透不过气来，而同这些街区混在一起的，则是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豪华“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租界里设有不准华人进入的高档饭店和餐厅，有英国人开办的绅士俱乐部。外滩的“爱德华八世”大道上布满了供海员消遣的酒吧，法租界里有“法国城”、“老佛爷路”、霞飞路、福熙路和“红衣主教路”，这些地方密布五光十色的商店、珠宝店和咖啡厅。当然，

别了，
上海

周边弄堂的中国小铺里也堆满了首饰和仿金塑像、象牙雕刻和琥珀制品。但是，在河对岸的浦东，一个个棚户区臭气熏天，而在人口稠密的沼泽地带，跳蚤肆虐、瘟疫流行。

1932年，日本侵略军进驻这座城市。1937年，日本军机对它狂轰滥炸。从此，这座城市繁华不再，萧条冷清。南京路上耀眼的灯光暗淡下来，贫民窟里的居民因失业和穷困而苦不堪言。

仅仅在日军占领的头一年，城市的清洁队就在大街上收殓了饿死和病死的三万多人。与此同时，在高达22层的富丽堂皇的“国际饭店”肮脏的角落里，纳粹外交官奥托马尔·冯·达姆巴赫男爵在玩扑克牌时，一夜就输了八万元。赢钱的是埃利亚斯·埃兹德拉先生，他是“巴格达阔佬”中的一个塞法德人①。所谓“巴格达阔佬”，是指那些11世纪定居在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丝绸之路上的犹太人。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在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此后，英国人割去了香港，开始在长江三角洲的上海港大兴土木，于是“巴格达阔佬”迅速占据了这一经济重地。将近一个世纪以后，英国人的银行和交易所就拿出钱来，为第三帝国供应锡、橡胶和奎宁。一旦需要，第三帝国也不嫌弃犹太人的金钱。为了获取稳定的利润，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横滨银行或沙逊洋行的主子们，自然不会反对自己彬彬有礼的伙伴。

今天的上海是向世界敞开胸怀的中国的一个大港，而在当年，在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1939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到1945年9月2日，在远东的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袭击后，日本宣布投降为止——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势力都麇集在这里拼死争名夺利，玩弄外交手腕，让私欲无限膨胀。这里是犯罪的渊薮，是国际冒险家、间谍、投机商、社会渣滓和潜逃犯聚首的地方，也是蝇

① 塞法德人，一部分操西班牙语拉迪诺方言（塞法德方言）的犹太人，原住比利牛斯半岛，后迁居北非、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各国和以色列。

营狗苟和大发横财的场所。中国人，也就是这个古老国度真正的主人，却被这些人踩在脚下——有些人为了填饱肚子而四处奔波，而汉奸们却在为保住或者增加自己从同胞身上搜刮来的钱财而钻天觅缝。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几个战场上又响起了尚未结束的残酷的国内战争的隆隆炮声——汉奸汪精卫拼凑的亲日政府、蒋介石的国民军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之间又展开了厮杀。

上海——纸醉金迷和穷愁潦倒之地。这里既有打着赤脚，拉着黄包车的毫无尊严的苦力，也有挽着醉醺醺的外国海员的胳膊游荡的幼小妓女；既有东方瓷器的温润，也有兵匪的粗野，还有鸦片和人性的堕落。但是，它又是最后一个救命的海岸，是本已陷入绝望的犹太人渴望生活下去的象征。这是因为，在那些伟大的民主派对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熟视无睹的岁月里，正是上海以一个开放城市有限的特殊地位，成为两万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得以栖身和自救的唯一地方。许多犹太人是知识分子，还有 3800 名犹太人在欧洲这座火葬场的烟囱还没有冒出滚滚浓烟时，就从各个被占领的国家逃亡到了这里。

虹口是一个街区的名称，它成了犹太人的居住区。

上海既是一座被犹太人诅咒的城市，又是一座他们得以活命的城市。

别了，
上海

谨以约瑟夫·海顿的第45号交响曲暨《告别交响曲》

作为开篇

黄昏时分，杨浦港笼罩着一层薄雾，微弱的光线勉强透进历经风雨剥蚀，破烂而昏暗的钢铁构件厂。从被爆炸的气浪击穿的窗户和墙洞往外望去，天空依然明亮。零落倾圮的水泥柱子和钢梁，由于马灯和纸糊灯笼摇来摆去，都在地上投下不住晃动的阴影。提着马灯或灯笼的人们在昏黄的灯光下也显得模模糊糊。有人从被炸坏的正门走进来，也有人径直穿过墙洞，踏着碎砖溜进厂房。

就像在演出一场荒诞不经的话剧一样，神秘莫测的听众从四面八方沿着台阶涌了进来。他们都穿着奇形怪状的服装，或者说都穿着很不适合这种场合的服装。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女士们都身穿压在箱底的旧式正规连衣裙，戴着大战之前缀有短短面纱的娇媚的大圆帽。她们把自己装扮得似乎是去维也纳金色大厅聆听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或者去柏林夏洛特堡参加宫廷宴会。某些男士也穿着不合时宜的没有燕尾的晚礼服，这种服装同他们的帆布裤子很不协调。同他们站在一起的另外一些人，个个穿着码头装卸工或者街头清扫工的破衣烂衫，一双光脚呈现出紫檀颜色。

一批新来的人把马灯和灯笼随手挂在高高翘起的钢梁上或机器零件上。当然啦，铺有铁轨的厂房十分宽敞——只是这儿从来就没有进过火车。萤火虫般闪烁的灯光要想填满构件厂这个黑洞洞的大肚子，

自然十分困难。

听众就像参加完星期日弥撒或婚礼一样，相互致以节日般的问好。时不时有人弯下身子，吻吻女士的手。不过，要是旁边有谁感到好奇，走近一瞧，即便光线很暗，也会发现那人的袖口已经磨出毛边，手指上还粘着皮革厂染色车间的黑色颜料，要不然，他就来自哪家缫丝厂。

不管怎么说，这种类似于一场滑稽剧的礼仪，仍然透出一种未加掩饰的激情。大家都在期待着一场隆重的演出。

厂房里的人越聚越多。在一种庄严的略显紧张的寂静中，只能听见人们的脚步声，有时又能听见人们的低声絮语和轻盈笑声。

厂房的一端临时搭建了一个乐台，乐台的上方晃动着一串热乎乎、湿漉漉，散发出一股腥味的海藻和死鱼，以及一条写着大红字欢迎词的横幅：

WELCOME! GOD BLESS AMERICA!①

乐台上还装饰着两面交叉放在一起的美国业余文娱团体的旗子，旗子上闪耀着人们用小块稻草纸和棉布片贴出的花纹，这令人想起两个乡村学校举办的棒球赛开幕式。

但是，这绝非学生之间的一场比赛，远远不是！

乐台上摆了一些椅子和几个固定在板条上的乐谱架，台下的空地上则是用钢轨搭成的极其简陋的长椅，新来的听众就在这些长椅之间穿来穿去，寻找自己的座位。前面几排长椅空着，它们显然是为贵宾准备的。

最后，贵宾们到了——他们是穿过几道先前被炸坏而现在垫着一些铁板的正门走进来的——一个个精神抖擞，气宇轩昂，铁板在他们脚下铿锵有声。他们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依旧迈着军人的步伐。这五

别了，
上海

① 意为：“欢迎！愿上帝保佑美国！”

十来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是由一名军官带队入场的。

空旷的厂房里响起了雷鸣般的呼喊声和鼓掌声。身着晚礼服或粗布工服的听众站起来，用掌声欢迎客人。美国兵不曾料到，他们在这非同寻常的工厂环境中，竟也能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因此，他们在空地中间的长椅上坐下之前，一左一右地向听众频频点头示意。

一名美军大尉把两手高高举起，向四围穿着晚礼服和粗布衣服的听众使劲鼓掌，回应大家的欢迎。这就让人难以分辨，到底谁是今天晚上这场奇怪的盛会的真正主人——是美国兵呢，还是这片废墟上的居民？

有一位男子衣衫普通，满头银丝，额头很高，脸色苍白。看样子，这个人曾经摆弄显微镜，或者曾在医院的白色环境中工作多年。他向美军大尉走去，微微欠了欠身子，用英语轻声自我介绍说：

“欢迎，欢迎，我是虹口自治区的西穆德·曼德尔教授，您的座位在前面，请跟我来吧。”

他毕恭毕敬地领着大尉往前走，可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想向大尉介绍卫生部门的一个日本军官。这个日本军官的指间夹着一支烟，孤零零地坐在一条长椅的末端。

“请让我给您介绍这位上校。他功劳不小……怎么说呢……总算盼来了这一天。”

正在沉思的矮个子日本人戴一副圆圆的屈光眼镜。他猛然一惊，腾地站了起来，不动声色地把烟卷扔在地上，用脚蹭了蹭，脸上露出令人无法猜透的愁容。他把两个脚后跟一并，敬了一个军礼——尽管他的军阶高于美军上尉。美军上尉吃惊地瞅他一眼，没有还礼。他当然有理由不理睬这个日本人，因为日本已于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号巡洋舰上签订了投降书。在上尉看来，虽然日本军官已经不戴肩章，但他现在本该在盟军的军事法庭上受审，起码也该呆在战俘营里。

上尉走过去了。曼德尔教授尴尬地向日本人笑了笑，又领着美国

客人朝前走去。

隔不一会儿，等美军军官坐下来后，世界上最糟的交响乐团的乐师们鱼贯走上乐台。他们的服装五花八门——既有破烂的晚礼服，也有下等人的工作服。

最先出场的乐师，腋下夹着一把小提琴，一头长发披在肩上。他在台上呆板地鞠了一躬，又很不自然地打了一个手势，要听众们停止鼓掌。一俟听众安静下来，他略显羞涩地小声宣布：

“下面是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属下的上海室内乐团演奏约瑟夫·海顿的第45号作品《告别交响曲》。”

有人又想鼓掌，但台下响起了要求肃静的“嘘嘘”声。

乐师们在一片庄严神圣的静谧中，一个个盯着一支点燃的蜡烛，然后又挨个用这支蜡烛的火苗点着了自己固定在乐谱架上的蜡烛。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小伙子们面面相觑——大概他们还没有在伊利诺州或者明尼苏达州的老家欣赏过音乐会上演奏的约瑟夫·海顿的第45号交响曲。

一部以另一种尺度创作于另一个时代的交响作品，过去总是在金碧辉煌的特定乐台上演出，如今却出现在令海顿略感奇怪和忧伤的场地上——出现在上海虹口区一个破旧衰败的工厂里。

在当年的欧洲和美国乐台上，著名的报幕员是技艺精湛的特奥多尔·魏斯贝格，可在今天晚上，报幕员却是一位小提琴手。他耐心地等着乐师们把自己的蜡烛点燃，然后宣布：

“下面是：Allegro assai, Adagio, Allegretto, Presto – Adagio。^①”

坐在自己乐谱前的特奥多尔·魏斯贝格略一停顿，点了点头。

厂房里响起了《告别交响曲》的第一组谐音。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音乐会：人们在暮色中踏进这座已被废弃的钢铁构件厂的厂房，闻着海藻味和臭鱼味，是要同上海告别……

别了，
上海

^① 意为“非常欢快、活泼、慢板、快板、急板—柔板”。

• 第一部 •

· 1 ·

1938年11月10日傍晚。

一场音乐会在庄严的音乐厅里拉开了帷幕。

由于水晶枝形吊灯的光线极其微弱，坚实的红木乐谱架上的诸多烛光显得尤其明亮。特奥多尔·魏斯贝格就像通常参加这样隆重的音乐会一样，身着时髦的晚礼服，而德累斯顿交响乐团的其他演奏家也穿得同他一样。

大厅里和包厢里的听众也身着正式晚装，凝神屏息地聆听乐师们的演奏。要在德累斯顿音乐厅演奏第45号交响曲，这可十分罕见，一票难求。

早在魏玛共和国之前，还在铁血宰相奥托·冯·舍恩豪森侯爵时期，也就是俾斯麦时期，坐在中央包厢里的都是些容克地主和他们的亲信，而今天晚上坐在这个包厢里的却是四个党卫军的军官。听众觉得，这个重要信号说明，德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四个军官中，地位最高的要数洛塔尔·哈斯勒上尉。这个美男子长着一头金发和一对蓝眼睛，就像印在柏林奥运会招贴画上的优等雅利安人一样。不仅如此，他还令人想起女导演莱尼·里芬施塔尔电影里的那些英姿勃发的明星。

最年轻的那个军官，大概是哈斯勒的副官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物